草木乾坤

以暴易暴

文潔華

人的感覺很奇怪，有時甚至分不開青紅皂白，日久生情便是了。

薩達姆是不是個暴君，答案是否還需深究？不重要。見到多年來風光的他頸項上套上了粗繩圈，死後嘴角掛血，又想到他被捕時鬍子掛面，襤褸不似人形的模樣，人們又總起了憐憫之心，特別是對於不了解實情，未歷其國其境未受其苦的他者來說，同情心沒有太大障礙。

卡扎菲亦如是。我聽聞他被殺的消息時身在意大利羅馬；卡扎菲的最後歲月曾到訪意大利，死訊帶來的震撼亦相對地大，媒體報道不絕於耳，反倒是我們這批亞洲遊人當作是血腥故事來傳述，繪形繪聲。網上的中文回應者表示難過，感到這是暴民的行為，然後又提到他生前曾經如何愛慕過前美國國務卿賴斯，一於當作名人版報道處理。

或許非理性真的是佔據了我們的潛意識，耳濡目染者都是朋友了，熟悉的面孔如此在暴力中死去都會惹來聲聲嘆息，是否罪大惡極或罪有應得都不曾深究了。也有人站起來說卡扎菲的生命如此快速地結束是便宜了他，應該要漫長審訊，奪去他一切的尊嚴。我們這些「外人」你一言我一語，不過當自己是世界政治鬧劇的觀眾，說話無須付上責任。

但倫理就是這樣造成的？怎樣的行為就有怎樣的暴力和下場？事先張揚的暴君和結局，一齣一齣地活演下來了，是人民在導演？是有利害考慮的組織在導演？還是像我們這些想當然的甚至非理性的外人？集體編導，集體行動，集體觀看那些在暴烈中消失的暴君；集體歡呼，集體嘆息。

古今談

超萬米鑽探　看穿藏滇寶藏

范舉

中國正在為地球做一次透視鏡手術，把地球變成透明，這樣，中國人就可以看到地質板塊下面，有什麼金屬元素或者石頭能源，以利於中國更快實現四個現代化，超越美國。

中國的西藏地區和雲南碧橫斷山脈，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產生石油和貴重金屬的地質板塊。如果能夠解開這個地層別的結構秘密，中國就有豐富的金屬礦產和石油天然氣礦產。在上世紀中國很貧窮的時候，即使有這個構想，也實現不了，第一需要三十億元的工程資金，第二需要犀利無比的鑽探地質的重型工具，要深入地質結構一萬公尺。

中國有三萬多億美元外匯，再去買垃圾債券是愚蠢死了。應投資於增值發財的領域。中國已經造出了高四十五米，佔地一萬平方米，重量超過一千噸的巨型鑽探機。如果達到一萬米的鑽井深度要求，製造費用預計超過一億元。而一個科學鑽打一個一萬米深的孔就要另需數億元投入。

全世界各國都在進行透視地球岩層的鑽探比賽。目前全球僅有俄國的「科拉超級鑽」達到過一萬米以下的深度。中國曾在二〇〇一年於江蘇東海縣啟動了自己的「超級鑽」，它在二〇〇五年達到了五千一百多米的深度。中國已有固體礦產勘探開採的深度大都小於五百米，而世界一些礦業大國已經鑽礦達到二千五百米到四千米，南非計劃開採的深度達到六千米。澳大利亞在本世紀初率先提出「玻璃地球」計劃，也就是要使地下一千米變得「透明」；加拿大人近期提出的類似計劃，要搞到三千米。中國要趕超世界，就必然要鑽至一萬米。

中國的西藏地區和雲南橫斷山脈，原來就是古代地中海的結構板塊，本來就是平原地帶，印度次大陸的板塊插入了西藏地塊的底部和雲南的底部，形成了劇烈的造山運動，把這個地區推高了六千公尺到九千公尺。六億年前的寒武紀火山噴發，把貴重的最罕有的貴金屬從地球核心噴了出來，藏在最原始的地塊裡面，後來的造山運動，又噴出了新的火山岩，把這些最古老的地塊的寶藏掩蓋了。兩億年前到一億五千萬年前二疊紀，這個時候地球的地層變動頻仍，地表森林和湖泊是生成大型油田和石油氣田的最佳環境。如果找到這樣的地層，就可以找到豐富的化石能源。中國的科學家認為，喜馬拉雅山和橫斷山脈，造就了中國神奇的礦產地層結構，因為這個地區把最古老的地層鏟高了，不埋於底層，甚麼昂貴的金、鈾、鈦、鋰、鈹、銅、鉆石、翡翠、石油田、氣田都有。西藏阿里地區、雲南騰沖地區都是聚寶盆，一萬米的飴井，如同CT透視，把一層層不同年代的地層秘密都切開，多少米有石油、多少米有金和鈾，都透視在中國人面前。

客聚

龐貝城與文明的衰微

葉輝

「一大片雪松形狀的烏雲突然出現在地平線上，巨大的火焰熊熊地燃燒起來。由於天空變得一片黑暗，火焰顯得份外耀眼。地震久久不曾停息，我們都不敢出去，因為那燃燒着的碎石真像冰雹那樣從天上猛砸下來……」話說公元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名羅馬少年目送舅舅普里尼乘船到對岸，他目擊維蘇威火山爆發，岩漿和蒸氣直衝雲霄，天地昏黑一團，火焰像閃電一樣偶而照亮大地，火山灰、浮石，碎岩如大雨般傾瀉而下……

後來，他寫了兩封信回家，描述災難的情景——那是龐貝城毀滅的見證。龐貝城坍塌了，然後，高熱水蒸氣遇冷凝成水滴，聚合空氣裡的灰塵落下，大雨推送着火山頂的灰渣，形成滔滔洪流，乾燥後就是一層水熔岩，坍塌了的龐貝城埋在地下五至六公尺深處。

英國人李登（Edward Bulwer-Lytton）一百多年前寫了一部小說，叫做《龐貝城末日記》；一九六三年深秋，二十三歲的葉珊（楊牧）到高雄碼頭報到，登艦之在友人家裡隨手抓了此書到金門，他一口氣讀完，自覺對「希臘文明的煙消雲散又有了新的體認，忽然非常厭惡基督文明，於是寫了一篇叫做《一個幻滅了的希臘人》的短文，說李登用他伊莉莎白風的彩筆敘述那古城的命運：「由奢華歸回廢墟。我們聽到昇平的歡呼，快樂的詩句，也聽到絕望的嚎啕和哀辭；我們看到花朵錦簇的園圃，宮牆，石柱，競技場，那些衣香鬢影，錦繡綢緞，也看到毀滅的天空、岩漿，塵土和怒海——愛情的節奏由激越轉為諧和，歸為寂靜。」

龐貝城毀於一旦，十年後，一位幾乎喪生於維蘇威火山的暴力下的雅典人格勞卡斯，從希臘寄了一封信給羅馬的友人，用「在平靜裡追懷」的語調說：「你邀我去羅馬訪你，唉，還是你到雅典來吧！我曾經發誓不再接近那座王城，不接近它偉壯的市廛和空洞的歡樂……」龐貝城滅亡於天火，希臘卻湮滅在基督教的神話裡。

龐貝城毀滅之前，希臘已經亡於羅馬人的鐵蹄下。雅典人格勞卡斯在龐貝城被屈指為殺人犯，執行死刑那天，火山爆發了，那是神的意旨，是奇蹟的極致，他脫險回到故土，保住了性命，卻像所有希臘人那樣，失去了自由和古典的莊嚴。他皈依了基督教，叛離了奧林帕斯諸神，青年葉珊寫道：「……從一個原始的神話轉到另一個極權的神話，這雅典人獲取了什麼？我們從雅典的來信裡不但看到一個一個老去的美少年，也看到一個衰微沉淪的希臘。希臘哪裡去了？原來希臘滅亡了兩次，一次是羅馬軍的兵火，一次是耶教徒謊言。」

從一八六〇年起，龐貝城開始被大規模發掘，整個遺址如今是一座用外牆圍着的博物館了，然而，不知道是否神的意旨，這座重見天日的古城將會像光輝的希臘那樣，注定要滅亡兩次，如果不是毀於文明的重建，就是在維蘇威火山再次爆發的時候覆沒。

據統計，這座活火山從公元七九年到一六三一年，噴火周期是每百年一次，此後平均十二年爆發一次，預計在未來二百年內，維蘇威將重施二千年前的故技，那時龐貝城將會再次覆沒在水熔岩下——有一回看一本旅遊雜誌，裡面有廣場上的牆基、石柱、牌坊，有圓形露天劇場、體育場的殘垣敗瓦，有大理石圓柱，有作坊遺址，還有用石膏灌注的死者空殼的模型——那就是龐貝城，於是就想起青年葉珊所說的「讓我們從龐貝城的瞬息繁華看希臘的衰微……」

百家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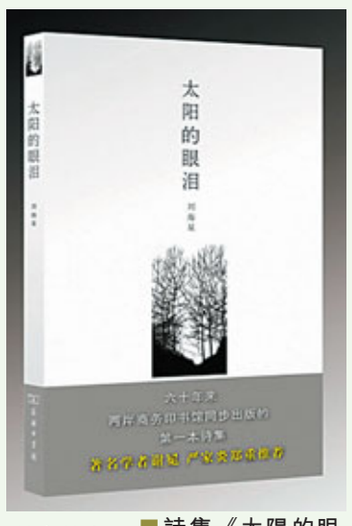
檢索海星

任芙康

前年春天，經老鄉雁寧介紹，與劉海星相識。往來幾句鄉音、方言，便多了一位大巴山的兄弟。海星老家江蘇，長於四川宣漢，這又添加一分親近，全因我的父親。父親小時跟着親戚，十一歲徒步四百里，到宣漢學徒謀生。此後數十年，父親對宣漢籍同事，多有關照；上街遇見宣漢口音的乞丐，總會停腳掏錢。當然，現在劉海星的宣漢，已今非昔比，百姓百業興旺，財政財大氣粗，被探明並已開採的普光氣田，規模之巨，當為中國乃至亞洲第一。隨着天然氣晝夜不息地外輸，人民幣像雪片般地飛向宣漢。

初識海星那天，送我一套他的《大美中國》攝影集。逐頁翻看，沒有一張外國照片，沒有一張都市照片。可見這個雲遊五洲見多識廣的人，這個長居深圳寵辱皆忘的人，已經在城裡住膩了。他不光自己要唾棄煩惱叢生的都市，還企圖用相機組合起純粹的自然景觀，引領他人跳離苦海，去追尋一種本原的回歸。所以，集子裡的多數作品，不光能讓人看出獨特的技術，還能讓人生出起伏的情緒。單說其中的山鄉攝影，層層疊疊的梯地，粗粗細細的田埂，似有若無的莊稼，我能明白，那些絕非自然生成的景象，全是由照片中看不見的人，用鋤頭，用犁耙，再混合汗水描畫而成的。這讓我聽到了自己的心跳，閃現出許多少年的往事。故而讀到集子裡介紹，僅在半年之內，劉海星連續於珠海古元美術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北京中國美術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了攝影個展（尤其是台北的展覽，在兩岸文化交流中，竟屬攝影領域之首次），我毫不吃驚，並能斷定，這種超乎尋常的驅動，可能有金錢的力量，但主要肯定是藝術的力量。

時間跑得飛快，轉眼兩年沒了。上月海星自成都來電話，說他十月份要在北京開個研討會。我以為他又出版攝影集，卻被告「這回換品種了」。過了沒幾天，收到《太陽的眼淚》。腰封上的廣告辭是：「六十年來兩岸商務印書館同步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打開書，幫其導讀的二位皆聲名顯赫，謝冕寫序，嚴家炎作跋。這是一種什麼概念？這是多高的規格，這是多大的面子！我依然毫不吃驚，亦能斷定，此番同樣超乎尋常的驅動，肯定不完全是金錢的力量，主要應該是藝術的力量。



■詩集《太陽的眼淚》。　網上圖片

■劉海星的攝影作品。　網上圖片

據嚴先生估計，詩卷中三分之一篇章，是寫給大巴山的。謝、嚴二位又都不約而同，表揚了《永遠的大巴山》一詩。兩位教授的評價，深得吾心。海星唱給巴山的歌，帶着情含着意，很硬的時候，又有柔韌；很土的時候，又有雅致。但是，若省去恭維，只講心裡的感覺，為大巴山寫詩，比海星更好的，另有人在。

這是我的一個毛病，常常不合時宜，說出一些讓人見笑的參照。比如，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萬萬千千的新詩，都不如郭沫若的《女神》。因為《女神》的呼吸及《女神》的脈搏，與眾人同步、甚至燃燒眾人的狀態，超越了當時所有寫詩的才子才女。又比如，我十七歲時讀三十年代的情詩，只覺蔣光慈的《牯嶺遺恨》為最好。別人眼中此詩可能無甚稀奇，卻在我懵懂的心裡，莫名地生出異樣的恍惚，成年後知道那或可稱之為哀婉與淒美。又比如，我曾讀到郭沫若中學同窗李冰如被抄家、毆打當晚，寫下的一首只有四句的詩：「一走二走三走，都未走出門口。門坎兒本不甚高，是什麼將我絆倒？」其惶惑、無助、憤懣，躍然紙上。身陷無法無天之境，七十五歲的老人沒有一句惡語，沒有一句狠話，但對暴虐的拷問，不着一字，盡得血淚，令無數同類控訴相形見絀。再比如，縱觀整段當代詩壇，賀敬之的一系列名篇，頑強地嵌入人們的記憶。不用現實主義的秤，亦不用浪漫主義的尺，自是氣象萬千，令人高山仰止。無關乎你喜歡與否，屈指數過，風雲際會這許多年，絕然無人能比。

我說這些，繞來繞去，其實只想說，論寫大巴山，搬出重慶梁上泉，就可告訴劉海星，你進步的空間還富裕。梁詩人今年八十整，仍長年行吟於川北山水間。如對他的詩有興趣，可以走捷徑，只須讀讀他1963年出版的《山泉集》，只須讀讀嚴辰為《山泉集》寫的序。讀罷梁詩，大約更能洞曉謝冕的序裡，為什麼語重心長：對詩的體悟包括「詩的想像性和表達情感的委婉隱曲」，「還有詩的音樂性（節奏、韻律和音響）」。此為前輩對海星的期許，亦是詩評家憂患新詩遠未成型，而對詩歌未來的嚮往。就新詩創作而言，想有一個好前途，毛澤東的意見還得聽：「詩貴意境高尚，尤貴意境之動態，有變化，才能見詩之波瀾。」「新詩應當精練，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若把這些話當耳旁風，再有幾十年，誤打誤撞的新詩，仍會活在糊塗裡，縱然群星閃耀，皆係流星劃過；縱然流派林立，卻是浮雲一片。

我們已經領略海星攝影不錯，寫詩不錯，經商不錯，卻未料他還熱衷書法，拿手烹飪。面對這位「複合型」人才，我不太想讚美他多方面的才能，只是欣賞他多方面的愛好。愛好比才能更重要。一個人趣味廣泛，對自身生活有充實和愉悅，也會令別人喜歡和親近。人生苦短，理應及時行樂，這個樂，就是快樂，快快地樂，不要克制自己的趣味，不要收斂自己的愛好。聰明的海星，從骨子裡風雅，一忽兒玩玩動，一忽兒玩玩靜，一忽兒玩玩剛，一忽兒玩玩柔，這對那些只懂得一根筋的人，對那些只習慣一本正經的人，對那些只擅長孤注一擲的人，都可以給予人生的啟迪。所以，需要謝謝海星。

生活語絲

菲島校友情

吳康民

應菲律賓校友之邀，赴馬尼拉參加他們兩年一屆的理事就職典禮。

乘國泰航空班機前往。原以為赴菲的「黑色旅遊警告」未解除，旅客必少。不料班機是用大型的波音七四七—四〇〇型的大飛機，經濟客位竟有九成坐滿。但乘客九成是菲律賓男女。心想菲國在國外的勞工數逾百萬，來往探親和公務的必多，故航空公司仍有生意可做。但港客則只有我們這一個三十來人的慶賀團。

馬尼拉市區五十年不變，新建築甚少，破落處仍然破落，相信在颱風及暴雨來臨之際，市區必然泥濘處處，垃圾遍地。但我們逗留四天，風和日麗，誠天公作美也。

去年香港一個旅行團在市中心遭遇退休警長挾持，導致八人慘死的悲劇。我們在電視直播中親眼看到菲律賓當局的處理失當和警方無能的全過程。稍有良知的都感同身受，悲同胞慘死的無辜，憤菲方無能又冥頑不靈。既沒有令人滿意的善後，又賠償道歉欠奉。因此，港人是支持特區政府維持「旅遊黑色警告」的。

也許有些校友身處菲國，感受和我們略有不同。他們覺得菲律賓的治安並沒有我們想像得糟，認為是屆菲國總統比前屆清廉，希望我們勸港當局解除「黑色旅遊警告」。

身處兩地，感受不同，當可理解。我們也並沒有爭論，相信港菲雙方仍需做一些工作，特別是要給港人「消消氣」，事情總是會解決的。

校友相聚，只談友情，不談國事。畢竟許多人兩年未見，師生之情倍見親切。到埗之晚，校友們在富臨酒家設宴洗塵，席間雙方多人登台高歌，氣氛十分熱鬧。菲華社會，擅長唱歌的大不乏人，有幾位「歌王」、「歌后」，水平直逼在香港歌壇現世的歌星。而且接班有人，校友們的兒女也有不少擅長歌唱者。

宴會延至十時半方散，回程中堵車仍然厲害，約十一時許才能回到酒店。整整一天的奔波，極為疲倦。回憶初來菲島，才五十出頭，今已垂垂老矣，歲月不饒人，信然。

一個打盡

發財快　立品慢

楊振耀

一個以存在幾千年優良文化傳統為傲的大國，今天再來討論呼籲國民關注道德良心，未免令人傷痛。究竟始自何時，眾人的道德良心開始被貪婪、自私、物慾、妒忌所蠶食；以至於體諒、同情、關懷、互信漸漸消失？有說「小悅悅事件」發生在小商品經濟批發市場之內，一個分秒追求利益的環境關係難免漠然；但賺錢及忙碌找生活不必然與人際關係淡薄存在必然關係。會否尊重別人的生命與安全權利才是問題所在。過去三十多年，各省市的經濟以不同速度起飛，物質生活改變速度之快，人數之多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來沒經歷過的。同樣，官員也從來沒有管理如斯多富貴人民的經驗。面對這個物質生活膨脹得比精神生活快不知多少倍的社會，有充裕時間發財卻缺乏時間立品，不出問題才怪？

二十多年前筆者在火車領教過平民百姓席地坐臥，擠得根本腳也放不下，在車廂要向前走只有踏在他們的身體上，但一票難求的民眾卻又毫不介意的場面。今天高鐵遍地開花，技術還要遠銷海外。當領導的功績，要靠硬件的數量與國民生產值來量，道德良心又值幾多錢一斤？

近日有人重提，要求為見死不救行為再進行立法討論。淪喪到要為道德行為進行法律強制，怕這民族距離滅亡不遠了。「小悅悅事件」把目前內地普遍社會道德缺乏，正積極研究該如何提升國民質素的討論帶上另一高峰。用血淚的教訓來吸引大眾的注意，付出的無疑是很大的代價。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把握這次機會，將會是另一條寶貴生命及一個傷心家庭無辜的平白犧牲。

記憶後書

火窟幽蘭

鄭政恒

李鐵是香港粵語片導演中的翹楚。五十年代的作品中，《危樓春曉》是現實主義佳作，《天長地久》是手法成熟的情節劇，《紫釵記》更是百看不厭的粵劇電影。到了六十年代，李鐵依然穩定地拍出教人讚賞的好電影。一九六〇年的《我要活下去》全片以實景拍攝為主，分述四個角色的犯案的苦衷與亡命過程，在當時想必是比較超前的，開首一大段馬場大劫案以視覺元素帶動，更是先聲奪人。

拍於翌年的《火窟幽蘭》卻是再上層樓，在社會與倫理困境兩方面有更深刻的呈現。《火窟幽蘭》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首先電影內容手法都具典型的現實主義色彩，小人物面對無錢、失業和貧病的問題，在煙鬼、賭鬼和爛鬼林立的「火窟」中，猶如脆弱無力的「幽蘭」，少女阿蘭喪母，獨力照顧年幼的弟弟，她們的父親從十年牢獄中獲釋歸來，也不敢貿然相認，只好假託為父親的朋友阿火，照料兩姊弟，可是阿蘭不領情——在此必需指出，我們的認知比阿蘭還要多，當阿蘭每一次拒絕和思疑父親的時候，我們不禁一而再憂心如焚，這樣既加深我們內心的無力感，也推展了劇情的悲劇感，更重要是我們對片中人物感情的理解，不覺提升了我們的道德感。

《火窟幽蘭》涉及了釋囚問題（後來龍剛在《英雄本色》也有出色的發揮），片中的聲音環境塑造和鐵枝意象，都表現得相當出色，影片的結尾充滿很強的反諷意味，更回應了李鐵自己的《危樓春曉》。其實，要說的還有不少，《火窟幽蘭》後天（三十號）四時半在電影資料館放映，映後討論會由我主持，屆時我再一一補充、細談吧。